

国内解决方案

中国能通过睦邻政策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吗？

中国广州的一处建筑工地。

Leslie Lipschitz、Céline Rochon和Geneviève Verdier

正如大多数旅游者寻求冒险一样，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正对中国存有一种好奇心：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极其庞大的国度，有着多层面的古老文化与历史，而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其产出与出口的急剧增长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该国的政治力量之大，也足以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即便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之中，中国仍然保持了较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就业水平的大幅下降正促使当局对其政策选择作出深刻反思。

IMF最近的一项研究（Lipschitz、Rochon和Verdier，2008年）试图用一个正式的增长模型来回答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一些普遍问题，以及在中国这一特例中与增长的驱动力有关的具体问题。

- 中国的赶超进程有何非同寻常之处？其大量的、不可忽略的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是成就了还是抑制了它的经济业绩？

- 中国工业非同寻常的竞争力究竟反映了其基础结构特征还是重商主义以邻为壑的（至少在过去几年是如此）汇率政策？

- 为什么中国尽管国内储蓄率非常高，仍然能有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过渡性的赶超型增长模型

在许多国家，产出（以及因此而来的收入）是由资本与劳动力在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中共同创造的。但是，产出的创造更多地依赖于令这些生产要素得以结合的制度与技术环境。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制度与技术环境发生改变，并

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率稳定增长。这种生产率的增长使得资本回报率提高，鼓励了投资，并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工资即使在将来也可保持稳定。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完善、技术改进、回报率提高、投资增加、就业增长以及收入提高的内生性进程。显然，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属于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然而，这是一个转型的进程：在某一点上，制度与技术环境将力图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准，此时轻易取得增长收益的时代就会终结，而经济的增长率将会回归到与发达经济体更类似的水平上。

这种赶超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农业经济中的劳动者将被吸引出来（由于农业生产力提高以及劳动力流动性增加）并投入到高增长的经济（通常是制造业）中。将这种劳动力“后备大军”投放到生产力高的就业岗位，是高增长的赶超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人口众多而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占较大比重的国家。

就中国而言，其传统因素是与众不同的（见专栏）。中国长期以来增长率和投资率都非常高。尽管起初较低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可能通常与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和持续的投资有关，但通过举借外债与通过较高的国内储蓄，一样可以轻易地为这种投资筹措到资金。何况中国的国内储蓄率极高——最近几年超过了国内投资的增幅。

营利主义战略？

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如Goldstein和Lardy，

2005年)认为,非常高的储蓄率反映出汇率被低估这使收入分布偏离于工资而趋向于利润,从而抑制了消费。中国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肯定影响到了名义汇率,但不清楚的是,中国工业极大的竞争力是靠这种政策,还是靠其经济的基础结构特征得以维持的。

让我们对下面的推想实验作一考察。如果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是均衡的——即工人的工资是按照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支付的,且政府使得人民币升值30%,实际工资确实会相应上涨(即名义工资因人民币产品价格而缩减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当这种影响不能完全传导给买家时,可能最终必然会迫使就业急剧减少,并给实际工资带来下降的压力——除非能以某种方式使劳动生产力也同时提高。

另一种有关汇率低估的更微妙的论调出自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因而与应用正规模型得出的结论背道而驰。试想中国的起始状况,劳动者那时得到的报酬低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存在着人民币币值实际高估的自然趋势——即根据汇率调整后的中国相应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了——这种趋势是通过防止汇率高估的干预政策被人为放慢的。在这种情况下,汇率高估会加快形成新的可持续均衡,而汇率政策实施上的拖沓正在使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减慢——该进程可能还带有产生短期竞争优势的目标。诚然,顺着

这些思路而得出一个论点可能还要有最初不均衡的证据——最显而易见的是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相佐证。

关于中国的争论大多数聚焦于作为中国增长战略之一部分的汇率政策问题。这些争论与其说热烈,倒不如说分量不足。原因是我们都力图更精确地使问题定形,而未能将起作用的基本力量涵盖进来。

关于中国的一个实际增长模型

我们曾构建了一个传统的真实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用以反映中国经济的某些显著的特征,并用一些看上去能合理反映中国现状的数字作为参数。

- 中国经济的模型不会对它举借外债时的利率产生影响,但会影响到其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

- 生产所需要的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本是生产的补充物。外国资本可以在全球市场上以固定利率获得。国内资本只能通过国内储蓄来得到。(由于能从境外获得的会讲熟练的中国话的技能型工人的可供量非常有限,如果有人认为国内资本就是人力资本,那他就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 模型聚焦于城市产业部门。但是,由于无论怎么看城市的工资都超过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大量富余劳动力都愿意移居到城市。移民的速度取决于劳动力流动的速度。

其中后两个特征推动着模型的建立。例如,如果具有累积的国内资本,就会提升劳动力和外国资本的回报率,促进移民、就业以及外国投资。由于外国资本的可获得性不受限制以及具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储备,国内资本就成为稀缺的要素;国内资本也赢得了丰厚的回报,并带来了高额的储蓄率。

我们通过不同的实验——生产力受到的冲击、外国需求以及利率——应用该模型来阐释这一机理。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劳动力处于流动的状况下,来自农村地区的过多的劳动力会使工资以及实际利率的变动减轻。与工资和实际利率的提高相比较,外国需求的任何增加都更可能带来就业增加和外国投资的增长以及更高的储蓄(这是对稀缺的国内资本回报增长的一种回应)。因而,该模型似乎反映了中国当前历史的主要特征——高储蓄与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看起来会维持在非常有竞争力的低水平的工资。而且,这种特征出自于一种“真实”的模型——一种没有机会去影响名义汇率的模型。然而,该模型的解释范围是有限的:它不能对可能预示着失衡的其他发展趋势——例如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加以解释。

中国经济要点

经济增长、储蓄、投资和外国投资都很高。

- 直到2007年,中国1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但在此次危机中,增长率将走低。

- 2007年的国民储蓄率达到54%,相比之下,其他样本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储蓄率为33%(这仍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储蓄率)。

- 2007年的投资率为43%,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率平均为29%;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则非常低。

- 中国的净外国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不到3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200亿美元以上。

制造业的工资按国际标准衡量非常低,但相对于农村经济部门仍非常高。

- 尽管可靠的近期数据难以获得,但200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工资水平的3%——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工资水平则为美国的33%。

- 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及城市居民的30%。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比率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驱动着国内人员迁移。

- 中国农业部门储备的富余劳动力大军估计可能达2亿人之多(见Banister,2005年)。

- 国内人员迁移受到农村地区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以及城乡劳动力工资的巨大差异驱使。

该模型还为研究当前全球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这里主要考察的是用数字表示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因为它具有较高的弹性；这一特征与中国经济对出口型生产行业的依赖相结合，带来了根据外部需求对产业部门就业的冲击进行调整的负担。外国对中国货物需求的下降给贸易条件施加了下降的压力，迫使中国企业降低价格、压缩利润，并使产业部门工资降得更低。而更重要的是，在最近几年劳动力向产业部门的流动趋势如此显著的经济体中，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也因此而大大减少，大量劳动力不得不返回农村。对于政府而言，抑制劳动力逆工业化的流动可能是政策上必须做的。

由于该模型出自新古典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因此它没有从短期政策分析入手。尤其是对回应渗透在需求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恰当政策——即不会伤及价格竞争力的政策——的任何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推断得出的。但是，结果表明，如果中国政府要找一个恰当的时间来刺激内需和减少经济对外国需求的依赖，现在正当其时。刺激内需的政策——财政刺激是各种手段之一——也许是缓解制造业部门就业岗位丧失的唯一途径。

政策结论与告诫

模型的实验表明，对于结构性特征类似于中国的国家来说，或许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工业部门相当低的工资、国内资本高回报和快速的出口引导型的增长的局面。但是，当基本特征发生变化时，危险就来临了，而政府当局或者仅仅由于惯性，或者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会抵制去适应这种变化。在面

临新的不平衡（如价格和工资压力）时力图坚持低工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实际汇率被不适当地定值）

“结果表明，如果中国政府要找一个恰当的时间来刺激内需和减少经济对外国需求的依赖，现在正当其时。”

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它可能带来通货膨胀上升的风险，并使通货膨胀预期变得根深蒂固，从而使扭转通货膨胀的代价高昂。在国外需求朝不利的方向发展时，它还会使国家冒过于脆弱的风险。

在当前外部需求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可能是维持增长与就业的唯一途径——当然，中国是不受外部融资限制的极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这种限制会阻碍这类政策的施行。而且，中国积极的刺激需求政策可能是一种“睦邻”的战略，对全球需求和解决当前的全球危机都是一种贡献。

Leslie Lipschitz是基金学院院长，Céline Rochon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讲师，Geneviève Verdier是基金学院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 Banister, Judith, 2005,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in China" (Beijing: Javelin Investment Consulting Company).
- Goldstein, Morris, and Nicholas Lardy, 2005, "China's Role i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Working Paper 05-2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Lipschitz, Leslie, Céline Rochon, and Geneviève Verdier, 2008, "A Real Model of Transitional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 IMF Working Paper 08/9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中国公共财政：推动改革增长，构建和谐社会》

楼继伟、王水林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ISBN：978-7-5095-1117-6，定价：40元

世界银行出版的新书《中国公共财政：推动改革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指出，中国在过去10年保持了9%左右的年增长率，使得贫困人口的比例从60%降低到目前的10%以下。但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收入和基本服务机会的不平等，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谋求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把重点从一味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更加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这要求加强公共财政。

本书包含公共财政和发展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中国高级官员和政策实践者的贡献，探讨了中国公共财政的很多方面。本书作者为财政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和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水林。

